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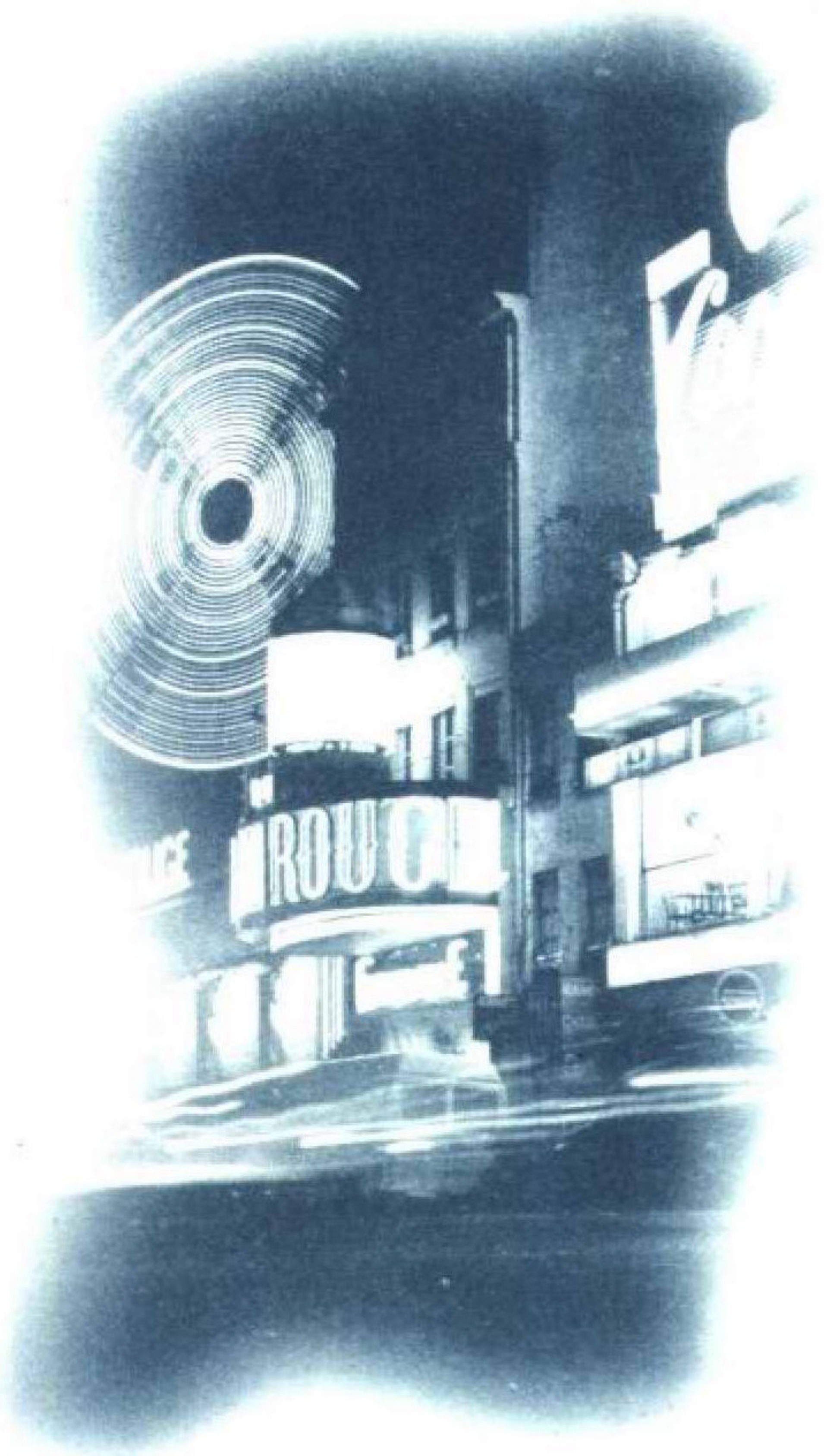
欧美优秀获奖小说译丛

爱在世界尽头

La marie-Marraine

[法国] 奥尔唐斯·迪富尔·著

陈良明 沈国华·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世界尽头 / (法)迪富尔著;陈良明,沈国华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1
(欧美优秀获奖小说译丛)
ISBN 7-5407-2755-1

. 爱... . 迪... 陈... 沈... .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252号

爱在世界尽头

[法国] 奥尔唐斯 - 迪富尔 著
陈良明 沈国华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彩色印刷包装总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字数 181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 - 5000册

ISBN 7-5407-2755-1/1 · 1637

定价: 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献给雅克

我们都身处在一个地狱的深处，
地狱中的每一刻都是一种奇迹。
——西奥兰

有一种习惯，那就是建造高速公路的人们常常用一个女人的名字来给这条公路命名。最常见的名字往往带有“玛丽”这两个字。还在孩提时代，并且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所知道的高速公路的名字就有诸如玛丽 - 热纳韦耶芙，玛丽 - 贞德及其他一些我难以忘怀的带有“玛丽”的名字。名字的第二部分一般都与打下第一根基桩的那一天在日历上固定的某位圣人或圣徒的名字有关。或者是如果在工程进展中发生了灾难性事件的话，那就干脆加上这个季节或年份的名字。我的兄弟路易就是在玛丽 - 十二月高速公路工地上丧生的。我一生中最令人难忘，也是最残酷的一年，是在位于北方一条运河旁开工建造、笔直朝布鲁日或者是阿姆斯特丹方向延伸而去的玛丽 - 贝尼舍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度过的。然而，建造这条玛丽 - 贝尼舍高速公路的男人们为了一位可怜的或许是幸福的姑娘，很快一致决定把它更名为玛丽 - 玛莱娜高速公路。或许是她本人的选择，也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位姑娘与这帮男人们整日形影不离，热情奔放地穿梭在这些充满着柏油气味的、在橘黄色气浪的作用下吱吱作响的平房里。

目 录

第一部 一场风暴的描写 (1)

第二部 对工地上民工的描写 (20)

第三部 对工地上女人的描写 (77)

第四部 对一次喜庆聚会的描写 (186)

生活的信念与希望 (后记)赵运仕 (236)

第一部

一场风暴的描写

死亡是一种独特的真理，它足以使人的智力和洞察力在几秒钟内增强十倍……

我得首先告诉你们，我是一个长着一头深黑带褐色头发的女子，也就是说深色的头发如同爸爸刚开始工作时所在的矿井里的颜色一般漆黑。有一部分头发渐渐变成了栗红色，其中闪闪烁烁透着工地上泥土的蓝色光泽。有时候头发变成了淡红褐色的，或者变成了棕色的，又或者变成了淡灰色的和黄

色的，又或者变成了红色的，在这无尽的把大大小小的工程机械都变得蓬头垢面，乃至在我眼圈四周的深处都布满了泥土尘埃的漫天灰尘中，我的头发的颜色无时不在变化着。

我和父亲以及两个兄弟保罗和路易居住在一辆车壁很薄但车身坚固的旅行挂车里。这辆外壳涂上了橘黄色、差不多与周围的颜色融合成一体 的挂车着实难以引人注目。

妈妈去世了，去世的那一年我十三岁。那时我们全家都在距科尔马几公里远的玛丽 - 圣人瞻礼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我在附近一所村庄的学校里上学。每过半年，但更经常的是甚至连半年都不到，我们就要换一个工地，也就是说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有时还会到另一个国家去，因此频繁地转学换学校对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

妈妈是在盛夏来临之时——对工地上的男人们来说，这是干活的最好季节——突然去世的。是我先发现她横躺在正在蒸煮着东西的露天煤气灶的旁边。以后，就是在这个炉灶上，我开始了日复一日地为丈夫吕西安烧饭煮菜，替他准备好带去工地的饭盒的生活。

妈妈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心脏是沉重而又细巧的内脏肌体，红红的颜色，略带一点淡紫色，布满爱的脉络。妈妈是在战后与爸爸结婚的，婚后，爸爸每换一个工地，她都 与爸爸形影不离。我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这辆旅行挂车里出生的。每年圣诞节，妈妈都会用枸骨叶冬青的树枝制作一棵圣诞树，有时候她用长长的野草做成一束束伴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木球做点缀的草束，使我们同样拥有一个不乏缤纷的传统色彩、也有圣诞老人在半夜送来礼物的节日。面对那些居住在市中心的真正意义上的房子里的孩子，我们从不曾有任何羡慕的情绪。圣诞节的夜晚，工地上所有的机器都会停止运转几个小时。漆黑的夜空里，在卡车大灯的照射下，扎进了泥土中的推土机的

推土板和齿状松土铲，还有那些被挖土机移动了土堆而绷紧
了单边吊索的大铲斗拉索式挖掘机都成了我们在节日中惟有的
彩灯和花环。混凝土搅拌机，拖拉机，大吊车，铲运机和大直
径轮胎的翻斗车，所有的史前动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庆祝救
世主的到来。

人们捧着一包包圆巧克力，一块块火鸡腿肉和橘黄色耀
眼的甜橙，从一辆挂车走到另一辆挂车，用好几种语言互相祝
贺着“圣诞快乐”，其中听到最多的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我是在五十年代前后，在一张铁床上离开娘肚问世的，以
后我一直睡这张床；现在，每当吕西安带着工人上夜班时，我
仍独自一人睡在这张铁床上。

帮助妈妈生产的是马里耶特，她的丈夫是拉索式挖掘机
驾驶员。是偶尔来工地给挖掘机送备用钢索的奥马尔跑去告
诉我父亲他有了一个女儿。父亲头戴着黄色的安全帽，身着茄
克衫，这装束使他在浓雾中显得十分潇洒，他脚上穿着布列塔
尼亚水手的长靴，那是在四月份，将近五点的时候。爸爸用两
手合成喇叭叫来了吊车工，于是年轻的小伙子们都站到了铲
运机上被抬升起来。整整一刻钟内，整个工地变得鸦雀无声；
接着，在爸爸的要求下，所有的工程机械都驶上了公路，以示
节日般的庆贺：拉索式挖掘机的铲斗和挖斗飞扬起一团团红
色的泥土，挖土机，天鹅脖子般细长的机械摇臂，大履带牵引
车，这些巨大的雄兽发出的雷鸣般的轰隆声，犹如为庆祝一位
王子的诞生而鸣响的礼炮。

喜悦，欢庆，节日般的快乐。接着，父亲顾不上摘下安全
帽，也来不及脱下工作服就来亲吻了母亲，也亲吻了我。当然，
我已记不起父亲亲吻我的情景了。但襁褓中的我肯定用青绿
色的眸子看到了他，记录下了他的第一个形象：一个工地上的
男子汉……他小心翼翼地不敢碰及我，而是我那像一朵小银

莲花似的揉皱的小手掌轻轻靠近了他的食指。

“给她取名叫埃莱奥诺尔。”

工程结束了。造好的高速公路被定名为玛丽 - 春天。

保罗和路易是我的两个哥哥。每当刮风时，他们俩就裹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带风帽的滑雪衫，在他们的滑雪衫上到处可见闪亮的斑斑水迹和像流星一样反复掉了又沾上的泥块。

保罗满工地到处跑，无所不干。他登上拉索式挖掘机，挖土，为翻斗车装卸泥土和碎石。路易是开翻斗车的。翻斗车是卡车中的巨人，装载量能达到五十吨。十多辆每晚在三公里道路上来回奔驰的翻斗车队组成了这一场永不停止的芭蕾舞。

我几乎总见不到我的哥哥。白天，他们脸朝着墙壁闷头大睡，而每天傍晚当我放学回家时，他们总是一语不发地捧着碗在喝咖啡。妈妈为他们准备好了饭菜。大家都不说话。我们从不需要有对话。在这个活生生地被剥去了一层皮、显得怪异和变成可居住形状的行星的尽头，大吊车的吼叫声混合着机械巨兽的喘息声，已使我们不再需要有其他的声音。我们的爱情亦是如此。灾祸也不例外，我们用脊背承受了永远是突如其来的，与无数吨水泥和混凝土一样沉重、一样无法挽回的灾难。但工程不准停下。这是惟一的绝对。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鲜血记录下了工程的速度，工程的残酷和这种永远缝合不了但也永远不会糜烂的巨大创伤。

是我发现躺在地上的妈妈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是一天的晚上，他们都走了，分头消失在这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工地上。这是一个我们与世隔绝的围城，或许正是因为“禁止公众入内”的告示牌，所以从没人会来这里。

“禁止公众”，那么谁是公众？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算不上公众，并且因为我们居住在旅行挂车里，所以总是有意把我们同波希米亚人混为一谈。只有当工地有了最终的身份，如什么1号高速、2号高速、3号高速、4号高速后，公众才会光顾这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那些我们想都不会去想的号码或数字。对于我们用玛丽加其他某个名字来给公路冠名的缘由，公众是永远不可能去体会和想象的，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把时速开到一百二十公里，急切地赶往海边，赶往八月的野营地。然而，无数条玛丽高速干道却毫无怨言地承受着成千上万的情人们。

妈妈死了。

……我在木梯上朝上走了三级。不同寻常的是我发现床上的被子还散乱着，床单撕得粉碎，枕头也被挖破了。尤其是这个平底锅，还搁在平时放在橱柜里的煤气罐上的灶台上。锅中的水已蒸发净尽。再接着跃入我视线的，便是这个躺倒在地的女人，确切地说一个又长又瘦的女人，前额贴在一双皮肤被洗衣皂粉液蚀成千万条壕沟般皱纹的红红的双手上。

我没有必要再走上前去，一切全明白了。死亡是一种独特的真理，它足以使人的智力和洞察力在几秒钟内增强十倍，使人能迅速提高判断能力去确认那一句让人忌讳的话：这个人死了。而不会去判断躺着的人是否昏迷不醒。妈妈死了。可几小时前，她还在用像履带齿轮一样的硬刷帚洗刷地板。一个活生生的人。脸颊是那么红润，鲜血流经心脏，循环着，循环着……

妈妈死了。我惟一认识的一个亲我、关心我、同我说话谈天、给我吃喝的女人不存在了。从此，我注定将要面对一个男人的世界。

我没有叫喊。我有两条长长的黑辫，顷刻间，它们在我的

颈脖上，在我的后背上显得如此地严酷。我没有哭。也没走近妈妈的身旁。我把书本夹放在了喜欢在礼拜天制作一些小家具的路易做的木凳上。我奔跑着穿过满地留下无数车辙和铲斗痕迹的旷野。工地是那种欧洲性气候的荒漠，脚下踩的，双手触及到的，进入视野的，无处不是严酷的感觉，这种严酷包括自由本身。穿着高跟鞋在这种地面上奔跑不可能去全力冲刺。工地不是女人们去的地方。

我奔跑着。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发出喊叫声，尽管内心的种种呼唤不由自主地要迸发出来。我拍打着翅膀飞跃在这一大片被橙黄色的尘埃盖得模糊不清的废铁堆上。笼罩在这里的是永远没有金黄色中心亮点的痛苦的红色。

爸爸正在一辆黑色外壳的铲运机上同一个嘟嘟囔囔对机车的轮胎狠狠发着牢骚的工人说话，在这只长方形的大怪兽身上，只有轮胎是惟一圆的东西。

尽管与父亲少有交谈，但我还是找到了要说的话：

“ 快 来 ， 快 来 ， 妈 妈 ， 妈 妈 她 ， 她 ”

“ 大声点！ ” 爸爸高声叫道，显然他对机车的噪声十分恼火，叫声中不难使人觉得他正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知道我几乎从不去工地玩耍，并且看到了我那月亮般惨白病态的脸。

“ 妈妈死了。躺在地上，在那里。 ”

机车的噪声戛然而止。出奇地宁静。只听到从喉咙口传出的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我看见驾驶员迅疾地跳下了铲运车。他是第一个听到噩耗的人。他转身对爸爸说道：

“ 我去找工人们，彼埃尔。 ”

他说完就走了，与身旁巨大的路堤相比，他的身影是不成比例的。确实，他们当中最高的个子也只不过刚刚达到一个轮胎的直径的高度。爸爸的脸色与安全帽的颜色一样黄。他本

来就话语不多，此刻变得更加沉默。但不要以为他没有痛苦。他此时的表情与那一天在玛丽 - 圣人瞻礼公路工地上当最大的吊车被风刮倒时完全一模一样。当然，吊车倒塌时，在吊车上方的玻璃驾驶舱里传出了一声巨大的犹如在荒漠中身处绝境时绝望的尖叫声，这叫声一半像动物，一半又如鸟鸣，这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将无法避免从十八米高度摔下地面的人迸发出的呼喊声。

妈妈死了。

在距村后不远的小公墓举行的葬礼上，我们来不及有时间去哭泣，将来我们也不可能再去那里。工地必须继续运转。两小时后，爸爸和两个哥哥把他们仅有的，式样也早已落伍的黑色礼服挂上了衣架。没有任何言语，他们又重新套上了滑雪衫和长靴……但我可以肯定，那一天晚上马达的吼叫声就像家犬对着逝者发出的哀鸣。再就是，父兄的第二天的饭盒，从此以后由我来料理准备了。

在玛丽 - 十二月高速公路工地上遇到的寒冷是前所未有的。这条从前一年冬天动工到次年三月竣工的高速公路，工程的艰难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此外，在建造这条从鲁昂通向巴黎的高速干道时，全法国久蓄在尿罐里的雨水都灌注到了我们的工地上。人们在哆嗦着。虽然我每天都往炉子里塞满燃料，不停地烧煮咖啡，但依然无济于事，那件同家里的男人们一样的外套，我终日穿在身上。我还把妈妈编织的那双大大的绒线袜套在路易的袜子外面穿在脚上，可仍然感觉寒气逼人，手指的颜色虽不是散沫花染的，但却冻得像散沫花一样。

不过，不要以为我整日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如果说我获得

了商业技术学校的毕业证书，那应当归功于世界学校，为了爸爸和哥哥，我一生忙碌着。

当天边刚刚显露出一丝日光的时候，我已在栗色的木罐里磨好了咖啡，木罐的手柄摇起来吱吱作响。工地里的一切，无所不响。要不就是我们兄妹三个。我把冷肉塞进面包，把小扁豆装进饭盒。再放一块诺曼底产的噶芒白干酪，还把葡萄酒和啤酒装进水壶里。我在用玫瑰色粗布缎子做的衬衫的外面套上了滑雪衫。他们还沉睡着，睡状如同在《巴黎风》中看到的飞碟一样，但在被铁丝网圈起来的工地里，飞碟是不会出现的。爸爸第一个醒来，紧接着是保罗。路易上的是夜班，他将在六点左右回来。寒夜敲击着门窗，在玻璃上结下了薄冰，我赶紧走上前去关上封闭式的护窗板。寒气扑面而来。快关窗。在这里，感觉犹如面对正在寻觅食物的野兽。一块接着一块，我终于烤完了长长的面包片。让我们不要辜负了白天。然而，在玛丽 - 十二月工地上，即将到来的白天又是那么漫长。

保罗伸展了一下四肢，忽然间，在伸展他那粗壮有力、能举起一百公斤重的石块的双臂时，我们的挂车一下便显得狭小了。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平房里亮起了灯。当我去生活区内惟一的一个泵水井台时，遇上了他们，他们谦让着让我第一个先打水。有家里的三个男人做后台，况且爸爸又是工地上的头，我什么都不用感到害怕。做一个他们生活中的女人，其生命的意义只是一幅简单的图表：妻子，女儿。除去这种从直观上去遵循的本原的生命结构，如果还有女人走近他们，那便是为了去那里与他们亲热，然后又会远离他们而去。哈西姆是长着满嘴大胡子的土耳其人，个子很高，是他替我把灌满的水桶拎回了家。每当我自己提着水桶回家时，水总是溢出桶边，湿透我的两腿，这时的我活脱像一条蜿蜒爬行的被冻僵了的白水蛇。哈西姆把水桶放在了我工作领地的阶梯上，这是一

块长四米、宽三米的橙黄色长方形区域。这时，平底锅已经烧干发烫，幸亏爸爸已往锅里加了水才没让锅底烧穿，尤其这时候天还没大亮，好危险。

保罗慢吞吞地喝着咖啡，他在咖啡里加了三块糖。爸爸正用胡子刷蘸着白香皂，我嚼着涂上黄油的面包。用胶合板做的内墙把厨房的一角隔离改造成了卫生间——如果我们的那些用锌铁板做的粗劣的大盆小桶能被称做是浴缸和洗脸盆的话。

男人们睡觉的地方好似狭窄的坑道，它们有不同的叫法：厅，卧室或工作室。我还埋怨什么呢？我有自己的房间。就是爸爸和妈妈原来睡觉的那一间。挂车的尽头，在木环吊着的布帘后面，是我的实际上已经改小了的居室，宽一米七，是一张床的宽度。太奢侈了。更何况我铺在床上的是一条摩洛哥被子，那是阿里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床边的墙上有一个小架子，上面排列着我那不多的几本书，其中有左拉的《小酒店》。如果我算是全家最有学问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读过《小酒店》，也都读过《萌芽》，以及《三个火枪手》。在一种草编的筐篮里，我堆积的杂志有《她》、《我们俩》、《妇女实用》。对，如果算上那些只有穿着鞋子或袜子才能踩洗干净，晾干后又永远缝补不完大大小小窟窿的衬衣，那真是太实用了。在这里，衣服的布料必须是那种做布景用的坚固的粗料。用尼龙布，不顶用，穿一次就扔了。我的手指已辨别不出什么是柔软的布料，什么是优美的轮廓，什么是席梦思床垫，手指就像铁锹铲进泥土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钻破席梦思。

缝补，烧饭，洗衣，趴在地上擦洗永远都刷不干净的地板，但我向你们发誓我不感到痛苦。我有我自己的乐趣，或者确切地说，有我自己的工地。在我的小架子上，搁放着我作的画。因为我会画画，我在七十厘米大小的画布上涂颜着色。最初——

那是妈妈去世的那一年——我画的是水粉画。以后路易给了我可以在白铁画料盘上随意稀释的真正的颜料。

在那些日子里，在我作画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心灵，我有点忘却了自己正在渐渐长高且变得瘦长，但站在这些被剥去表层的土地上又根本算不上什么分量的身体。每当下雨，或者遇上湿冷，结冰，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鬼天气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这四平方米的地方。我只能蹲着作画。那里没有放画架的位置。

我画的是寓言里的狼和小羊。狼画得很大，犹如巨大的吊车，脚上套着像我父亲和我哥哥一样的长靴。我差一点没画上一个脚踩着履带的大狼。如寓言叙述的那样，与狼隔岸相对的是一只身上长满茸毛，尾部隆起的雌性小羊羔。在小羊羔和吊车狼中间的河谷里流淌着绿色的河水，水中生长着睡莲。但，仔细琢磨，更加显得饥肠辘辘的是小羊羔。那狼，还可以。它经历过饥饿，知道在味道涩口的食槽里吃东西是什么感受。我在思考我的灵魂。首先是肉眼看不见的小动物，接着是长长的百脚巨兽，强求开足机车灯光照亮它四周的黑夜；目的是极力看清道路，极力不在因为大雾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坡地以及像犁刀和滚筒般起伏不平的路面上失去平衡。巨大的，是我的灵魂，她透射出闪光的东西，这就是被我们工地上的男人们称做为运气的亮点。

我在颜色盘里浸了漫画笔。色彩，是这世界上我最喜爱的东西。即使是这一道道用泥土和钢铁构筑的彩虹每一次都变成了崩塌物，变成了鲜血。这鲜血，是红色的。

爸爸和保罗走后，我收拾起碗勺，放进小桶里洗刷，桶里的洗洁剂变成了泡沫。我又洗好了另一个略小一点的碗边绘有花朵的碗，那是路易的碗。如果我说过在这世界上色彩是我

的偏爱的话，那么我要作一下修正：在这世界上我最爱的是我的二哥路易，他比我大哥保罗小两岁。路易平时话语不多——但我们三兄妹中又有谁是夸夸其谈的呢？路易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是我见到的最英俊的小伙子。他的个子与大哥保罗一般高，但更修长，长着一双宽长的整日睡意朦胧的棕色眼睛，眼睛的深处跳动闪烁着太阳的光芒。我能听出他的脚步声，一步加二步的节奏，一步重，二步轻。活像一只猫。他是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但他梦想着拥有鲜花盛开的花园和一幢像玻璃一样透明贼亮的房子，宁静的房子里铺满厚厚的可以躺在上面睡觉的地毯。一幢梦寐以求的房子，他将带我去那里，给我买许多颜料，许多鸟，许多精致的乳白色长裙。路易今年二十一岁，我十六。我的布娃娃的那些家具都是他用小刀给我制作的。我不愿他离开我，我每时每刻都等着他回来。我在炉子边烘干了他的布拖鞋。在这寒冷的夜里他会不会着凉？出门前我替他拧紧了暖水壶的盖子，可谁知道以后会怎样。有时候，抖出的水湿透了他的鞋子，甚至湿透了用麦秆加厚了的鞋垫。

他推开了门。那时夜幕早已降临。“你好，小鼬鼠。”他说道。在还来不及解开纽扣的宽大的工作服里传出了他的声音，在这被纽扣紧锁着的工作服里有一颗滚烫的心。

“你好。”

永远是简短的话语。但，我却是多么地喜欢我的哥哥！我迫不及待地把手端到他面前。他来不及脱下衣服就把碗捧到了嘴边。他的手指已冻得发紫。他一边搓着手指一边说道：

“该死的天气。”

天气从来就没好过。他在还没有折叠起的床边坐下，从口袋拿出了一支高卢牌香烟。

他脱去了长靴和外套，此时的他显得很瘦长。他从鼻孔中

呼出烟雾。这是一匹疲惫不堪的高头大马。他一把拿起朗姆酒瓶，对着空空的碗底满满地倒了一碗。

“该死的天气。”

他撩起我房间的门帘，看了看画板。

“小鼬鼠，你应该抹去河谷中的睡莲。河谷里都是水。难以支撑住。”

玛丽 - 十二月高速公路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工程，那是一条无时不在向工人们发难、不在与施工机械作对的非同寻常的公路。当工人们以为竣工在即时，它却在雨水中伴着卵石倒塌了。路堤像病人的肿块一样坚硬。纵然有无数把飞扬的铁锹共同发起进攻，却难以将它铲平。

……然后，光着上身的路易披上条纹布睡衣。夜里犹如火星人，白天如同苦役犯，昼夜不停，睡觉成了奢望。

浓重的夜色里，突然，他跌倒在地，脑海里没有梦。没有任何鲜花和花园的梦。惟有的是，在神怪的背景的衬托下，一些巨人伸展着因为雨水而发亮并发出尖锐且刺耳响声的手臂，令从翁弗勒飞来的迷途海鸥望而生畏，飞离逃去。

在他睡着的时候——一直到三点——我在隔墙后面洗了个冷水澡。一丝不挂的我冻得直哆嗦，我以最快的速度用肥皂擦洗了身子。我的毛巾搁在胡子皂旁边。因为冷得够呛，我几乎是摸索着走到了牙刷缸旁。自由自在地洗澡，擦身。这便是我们的享受。更何况我用的是罗杰 - 佳莱牌花露水，那是路易送给我的礼物，是我们家最高级的。

路易还睡着。他仰卧着，一只手放在胸前。黎明前刺骨的寒冷穿透了门窗房墙。我在不戴胸罩的上身——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胸脯——套上了原先是为路易编织的毛线衣。是我自己搞错了尺寸。太小了。那我就自己穿吧。再说，打毛衣前我